

■ 山海经

章丘之丘

□ 王繁荣

现在章丘人写市名时，大都写“章丘”二字，已经很少有人写那个带耳旁的“邱”字了，可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前推至清前期，该县县名是应该写“章邱”二字的。

自公元596年设章丘县，章丘建县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。从目前发现的历代碑文看，涉及到县名时有写“丘”的，也有写“邱”的，造成这种不统一现象的原因，源于历史上的几次“丘”改“邱”。据史料记载，历史上为避“孔子名丘”讳，先后于西汉、金与清代时，在全国或小范围内改“丘”为“邱”。金代及以前的石碑目前在章丘尚未发现，但元、明时期的石碑均为“章丘”二字。而到了清雍正后，章丘的“丘”就变为“邱”了，这源于清代的尊孔运动。

清兵入主中原后，被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所同化，清朝统治者也逐渐发现，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”的儒家思想，有利于封建统治。据《清实录》记载，清雍正三年(1726年)，礼部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，奏章云：“先是由孔子圣讳，理应回避。惟祭天圜丘，丘字不用回避外，凡姓氏俱加偏旁，写为‘邱’字，如系地名，则更易地名。至于书写常用之际，则从古体丘字。”雍正皇帝看后思准，于是为避孔子名丘之讳，章丘就只能写做章邱了。

这个“邱”字一写就是200多年，那么又是什么时候改为“章丘”的呢？1956年，为了加快文字普及和推广，国务院公布了《汉字简化方案》，在全国开始实施，本来“邱”字不在简化之列，但章丘人乘汉字简化之风，索性把“章邱”写做“章丘”了，为什么呢？一是“丘”确实比“邱”简单好写；二是此时孔子的崇高地位早已在人们心目中动摇，章丘县名为何还避孔子讳呢？好像约定俗成一样，“章邱”逐渐变为“章丘”了。

县名改字也算大事了，在相关档案中并无记载呢？就这个问题笔者曾查阅建国后县委、县政府文件，没有找到。但笔者发现一个规律，凡是1956年前的文件中都写“章邱”，1956年后的文件中陆续出现“章丘”了，但文件上的朱红大印仍然是“章邱”，可见“邱”改“丘”是一种民间行为，如果政府专门为此下文，公章也是要改的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各单位公章中的“邱”也改成“丘”了，在那个狂热的年代，这个“邱”字好像总有点封建主义的味道，让人看着不舒服。但尽管如此，有些老年人还习惯于写“邱”字，这在“文革”中也不是什么上纲上线的问题。

真正完全彻底地统一成“丘”字，是1992年，该年的8月，经国务院批准，章丘撤县设市，辖区不变，由济南市代管，成为县级市，所有单位名称的公章、信纸、号牌等统一改为章丘，20年过去了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写这个“邱”字了。

“丘”与“邱”对县(市)名来说虽是一视之变，却包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。中央电视台栏目曾播出过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位持宝人拿着铸有“章丘”字样的清光绪年间的银钱谱专家鉴定，专家仅凭“丘”字就断定是个赝品。如今章丘一著名景点，池旁有两碑，一用玻璃罩住的旧碑，上书保泉内容，有被破坏的痕迹，另一则是复制品，将原文誊抄其上，但将原碑中的“章邱县”改为“章丘县”，此碑立于清同治年间，正是避“孔子名丘”讳时，这在过去封建礼教甚严的年代是绝对不会有的，看后令人脸红。

□ 责任编辑 于岸青

法藏见了大宋天子之后，当廷就被封为“光正大师”，赏赐一件紫色袈裟，礼遇非同寻常。同时，法藏还带着舍利金瓶，奉宣云游，到五台山、川西、泗州等处，逐处斋僧一万人，各送金襴袈裟一件。政府也让沿途给他提供食宿条件，可见这次巡礼规格之高，耗资之巨。那么法藏究竟是何许人？

兴隆塔地宫的文化谜团

□ 本报记者 任宇波

兖州，为古九州之一，历来为商贾云集、文人汇聚之地。

如今，兖州也正创造着新的历史。于2010年9月正式破土动工的兖州兴隆文化园，依托有900多岁高龄的兴隆塔，正按照“一园三区”的总体布局进行规划建设，力求打造具有浓厚佛教文化色彩的旅游景区和文化交流基地，形成山东儒释道即登山(泰山)、拜孔(曲阜)、礼佛(兖州)新的经典文化旅游黄金线路。

据兴隆文化园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周鹏介绍，这一人文景观的构思与设计，其灵感均源自于兴隆塔地宫考古新发现的佛教圣物。

法物殊胜，精妙第一

兴隆塔，现位于兖州市博物馆院内。2008年8月17日，地宫被完全打开，展现在世人眼前。它位于塔基下中心位置，底面为正方形，边长2.28米，中心处顶高3.1米，为青砖砌筑而成。地宫顶部为穹窿形，砖砌仿木构16排斗拱，中间形成的天井为正方形。仰覆莲花座放置在地宫中央，其上为长方形石函，函上有盖。地宫中心有地井，上圆下方，口径0.26米，深1.68米，井水极为清澈。

从地宫所处文化层以及出土器物推测，专家们初步判断地宫建于北宋时期。位于地宫东北侧的一个记事碑，上面落款为北宋嘉祐八年，即1063年，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判断。

在所有出土文物中，舍利金瓶光彩夺目，里面盛装47颗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。它通高13厘米，重达62克，纯金制品，瓶体为宋代典型的瓜棱形，顶端一比丘坐坐清静道场，神情肃穆，坐姿庄重，合十行礼，雕刻落锋利索，线条朴拙有力。碑刻文字中有“安葬舍利金瓶一两”，即是指此金瓶，为国内首次发现。

出土的石函，也令人称绝。石函左右两侧，刻画了佛祖将欲涅槃，众弟子、护法神等得知纷纷赶赴，劝请佛继续住世，接受最后供养这一场景，并有“梵王众”、“帝释众”、“天王众”、“波旬众”、“比丘众”等榜题铭文。前后两侧分别为菩萨和天王形象，函盖刻画了龙、牡丹和金翅鸟图案。人物线条精美流畅，形象栩栩如生，图案纹样饱满，颇有唐风，这在国内现有的宋代文物中绝无仅有。

石函内的盛金银椁长0.45米，宽0.25米，高0.28米，以银做成棺的形制，表面鎏金，采用了打作、捶揲、铍铸、篆刻、铆接、镶嵌、鎏金等多种工艺手段，是已知宋代金棺中工艺最精细、图像最丰富的一件工艺品，也是我国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鎏金银椁，同时出土的相似佛教圣物中规格无出其右，上面篆刻的佛祖涅槃图让参与研究的专家们睁大了眼睛。

《大般涅槃经》记载，二月十五日，佛祖临涅槃，普告众生：一切众生若有所疑，今悉可问，为最后问。大弟子大迦叶、护法金刚力士、佛祖的最后供养人纯陀居士等立于左右，聆听佛祖最后的垂训。鎏金银椁上，只见诸众生举手拍头，捶胸叫唤，其中或有身体颤慄，瘫倒在地，涕泣哽咽。

但有几个不同寻常的人物，罕见地出现在鎏金银椁上，令人惊奇。佛祖脚下，有一个女性形象。专家们推测，银椁刻画的这个在抚摸他双脚的女性，应该是他的生母摩耶夫人。据佛经讲，佛祖涅槃时，感动了他的母亲摩耶夫人，她从天宫来到人间，和儿子告别。

另外一些形象，却让专家们感到匪夷所思。在这幅静谧哀戚的佛祖涅槃图上，赫然出现了一个恐怖的面孔。此人不但三头六臂，还头戴骷髏，手举日月。他们认为，这是左道密教护法神中的阿修罗王，他在佛即将涅槃的时候，护卫道场。

但是，金瓶、鎏金银椁从何处来？由谁带



左上：金瓶
上：鎏金银椁
左：安葬舍利纪事碑
下：兴隆塔

来？为什么处在儒学中心区域的兖州，却出土了密教的阿修罗王图案？而且，在被专家称为“临涅槃”的画面上，还有两个少见的胡人形象被篆刻出来，一个是个子比较矮小的胡人国王，做着舞蹈的动作，另一在文殊菩萨旁边，给文殊菩萨牵狮子的狮子奴，头戴胡帽，深目高鼻，满脸络腮胡须，显然是一位胡人。

一个个谜团像雾一样，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，看来要寻求答案，同时出土的安葬舍利纪事碑意义重大。它上面刻满铭文，通篇32行，910字，或许就记载了兴隆塔地宫的全部秘密。

高僧法藏来自于阐国

经过专家们对纪事碑的深入解读，一个久远的历史故事，渐渐铺陈完整。于阐国一个叫法藏的高僧也随之走到了历史前台。

地宫出土的这块宋嘉祐八年十月六日(1063年10月29日)的“安葬舍利”碑载：据《龙兴寺西天石窟研究院原所长温玉成研究，于阐国王法藏拥有僧人、使者、皇族的三重身份，而新疆博物馆研究员贾逸认为，法藏应为于阐皇族，是于阐国王李圣天的儿子，新国王李从德的兄弟。

公元970年前后，在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的战争中，于阐国遭失利困扰，国王李从德不得不派使臣出使中原。他任命法藏为使者，前往开封求援。

碑文中也记载，云游四方的法藏在兖州住的时间渐长，爱上此地的民风淳朴，于是决定



不再回国，在此安度晚年。事实上，在他出使宋朝期间，国内发生了战乱。经过20多年的惨烈战争后，以佛教为国教的于阐国最终被喀喇汗王朝灭掉，而当时的北宋正忙于中原的统一战争，对于阐是爱莫能助。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覆亡，而且也导致了佛教在一个国家的灭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一个皇室成员的法藏，“在兖州住寄岁月，恋皇帝化风，不归本处”，是自然的选择。

时间又过去了30多年，1008年10月，一个浩浩荡荡的皇家仪仗队向泰山驶去，刚与北辽签订“澶渊之盟”的宋真宗开始了泰山封禅大典，在众

■ 群贤毕至

贾三近图兴漕谏言献策

□ 董运启 李 麋 吴梦茵



贾三近

于是便上了一道《申请漕臣慎守成法，以图经久疏》。

贾三近认为，京师为“王者所都，万方辐辏，六军糗粮，百官廩禄，人众众狭，不足以供。”自大明朝定都北京以来，每年都需从南方调运漕粮四百万石，即使严格按人口供应，也很难有盈余。何况而今人口比从前增加了许多，而漕运设施又多

有损毁，有识之士尤为担心，因此漕臣每每建议，要求改革漕运方略。有鉴于此，贾三近在奏疏中恳请隆庆皇帝“留神国计，敕下户部，再加详酌，申明旧例，移漕运衙门务在恪守成法，严禁改折。”要求漕运官员役夫要千方百计将四百万石粮食及时运抵京师，不能以银折粮。以保证供应，维护稳定。

贾三近的奏疏得到隆庆帝的重视，遂下令恪守成法，严禁改折，避免了一场危机的出现。

万历初年，中原板荡，天灾人祸频仍，先是海运倾覆，粮漂人亡，京师供给紧张，继而江淮风雨异常，海啸河溢，陷溺人民，哭号震野，贾三近疾书请赈救灾。万历元年六月十一日贾三近等人接得巡抚山东右金都御史傅希季、巡按山东御史俞一贯的揭帖，说本年五月初四日海运各船，提前到山东即墨县徐福岛等处，忽遭异常风雨，冲坏粮船七只，哨船三只，漂溺粮米几近五千石，淹死随船运军水手朱璠等十五名。贾三近接报不胜惊悚：不说这数千粮餉委弃泥沙，良为可惜，单就这数十名无辜运军水手葬身于大海，已是何等的凄惨。贾三近认为这是决策上的失误。海道与河道两相对比，海上险不可测，这是常有的现象。而河

渠则不然，日常风平浪静，恬然安流。因此，依靠河道漕运为主，而海道运输只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。因此贾三近于万历元年六月上奏，请求朝廷下令停止海运，一力河运。

贾三近的奏疏写道：“臣等窃惟储积系国家命脉，而河海为转运梗咽……海道之势与河道异，惊涛怒浪吞山卷雪，弥望而不可测者，海道之常也……夫世有夷途，安取九折坂？人有参苓姜桂可以摄生，奈何试命乌附以苟求万一哉！故权安危之机，审利害之辨，河运之与海运，大势较然也。臣等浅劣，谬任职掌所关，冒昧上请，伏乞皇上矜念国计，敕下该部再加详酌。如果以海运损慎事，风涛可虞，姑暂停止。”

很快朝廷采纳了贾三近的建议停止海运，将原定十二万石漕运粮米，即以万历二年为始实行河运。所需船只、官旗等项，悉听户部安排漕运衙门调度。

贾三近十分赞同开发鲁南运河。早在明嘉靖七年(1528年)左都御史胡世宁提出开凿夏镇南阳新河，直到嘉靖四十四年(1565年)七月，“河决沛县，上下二百余里运道俱淤。”奉命治河

的工部尚书兼理河漕的朱衡力主继续开挖这条新河。获准后，经过两年的努力，方才完成了这项重要工程。

万历六年，新上任的工部尚书李幼滋，配合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，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，如来自山东的大臣贾三近和于慎行就是新政的反对者，但对治河工程他们却又十分赞同和支持。

李幼滋重新起用潘季驯总理河漕，一改过去分导疏流，而贯彻以堤束水、以水攻沙的办法，结果成效显著，不到三年，规模浩大的“两河”(运河、黄河)工程，先后动用夫役八万人，耗银五十六万两，终于在万历七年十月间提前完成了主体工程。对这次治河，贾三近十分赞赏，因此在其第二次请告家居时，亦曾陪同父亲贾梦龙，并邀约好友李化龙等赶赴徐淮察看河南南徙、黄运交流，一同拜谒了微子墓、留侯祠及歌风台，尽情浏览了南阳新河，并赋得长诗《漕渠奏绩歌》。

万历三年，为尽快开通运河，朝廷派户科都御史张位前来鲁南对运河河道进行详细勘察，力求拿出最佳方案。此时正值贾三近第三次请告家居，正好协同张位现场勘察了运河河道，并建议将通道北移东岭以北(今韩庄湖口)一带，但他们的努力仍然未果。鲁南运河历尽波折，直至20多年后的万历三十二年，运河河才在舒应龙、刘东星、李化龙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彻底疏通，成为京杭大运河重要的黄金水道；而在此之前的万历二十年，贾三近因病撒手人寰，竟然没有看到运河滚滚东流……

明朝隆、万年间，山东峰县出了个贾三近，曾任光禄寺卿、都察院右金都御史，在峰县城建有“都堂馆”，乡里人都称他为“贾都堂”，只要提起贾都堂，鲁南苏北几乎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据《峰县志》记载：“贾三近，字德修，号石葵，又号石屋主人、兰陵散客”等，于嘉靖十三年(公元1534年)出生在河南南阳学舍，不久，因祖父贾宗鲁去世，随父亲贾梦龙回到峰县故乡，在父亲与季父贾梦鲤的教授下，于嘉靖三十七年(1558年)夺乡试省魁，又于隆庆二年(1568年)赴京会试，高中进士，以博学鸿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。直至万历十四年(1586年)升迁为大理寺卿。万历二十年(1592年)，宁夏副总兵哱拜反叛，朝廷用兵，拜贾三近为兵部右侍郎，未及到任，因背疽病逝，年仅59岁。

贾三近为官20余年，他博学多识，清正刚直，关心吏治民生，敢于谏言献策，发表意见，上奏议言，大都切中时弊，匡济大略。今存《峰县志》所载奏疏24件，包括清吏吏治的10件，为民请命及救灾济民的10件，论救言官的4件。其中有关漕运的5件，集中反映了贾三近伤漕政、罢海运、开新河、以固根本的漕政思想及漕运文化。

明代到了隆庆、万历，特别是万历朝，已经是政治颓废、吏治腐败，国势衰微。表现在漕运方面则是管理失政，弊端丛生。贾三近认为，要想改变这种局面，振兴大明帝国，必须励精图治、依法行事，体恤民生，增强国力，以安天下。隆庆六年(1572年)时任吏科给事中的贾三近面对各地将漕粮改折白银的做法，担心国库无储情形的出现，